

# 中國歷史論文集

許倬雲等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 中國歷史論文集

許 哲 雲 等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一月初版

四五三一一

中國歷史論文集 一冊

基本定價六元正

著作者 許倬雲等：

發行人 朱建民

版權印翻  
有所必究

發印行所及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校對人：吳瑞華 宋麗萍

# 中國歷史論文集

## 目 錄

漢代中國體系的網絡	許倬雲	1
宋代詞科考	林瑞翰	29
契丹靈徵與元魏之關係	趙振績	47
遼金地方監察制度略論	楊樹藩	51
大蒙古國的國子學——兼論蒙漢菁英涵化的濫觴與儒道勢力的消長	蕭啓慶	61
僕固懷恩與李懷光的反叛	章 群	87
清初朝鮮潛通明朝始末	劉家駒	121
唐代御史制度	王壽南	163
再論漢宮位置	馬先醒	207
明武宗時代與琉球王國關係之研究	徐玉虎	233
三國志注與裴松之三國志自注	遂耀東	257
唐蒙通夜郎道的探討	桑秀雲	273
隋唐政權中的蘭陵蕭氏	毛漢光	287
我國歷代農田施用的油粕肥料——兼論植物油	陳良佐	307
高麗忠宣王諒的農業政策	王民信	347
江蘇鐵路風潮——一個社會運動的實例	王樹槐	355
漢代「故事」考述	邢義田	371
傳統法典始原——兼論李克法經的問題	杜正勝	425
宗藩關係制度的運作——以朝鮮與努爾哈赤的第一次糾紛為例	張存武	451
李保泰殘存詩文序	杜維運	467
岳鍾琪的家世及其發跡略考	陳捷先	479

裴松之歷史評論的思想根源——兼論尊經傳統的回應	.....	盧建榮	493
金代政權合法地位的建立	.....	陶晉生	519
漢武帝經略北疆的戰略部署——兼論中國北疆問題的特性	.....	管東貴	533
關於漢代的宦官	.....	蕭 瑄	563
前漢的試守制度（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8 年）	.....	陶天翼	613
清初的滿洲貴族（1583-1785）——鈕祜祿族	.....	黃 培	629
中國市場與門戶開放政策的宣佈	.....	孫同勛	665

# 漢代中國體系的網絡

許倬雲

秦併六國，天下爲一，從此開始了中國大一統帝國的局面。至於漢初，中國在政治上是統一了，在經濟上則仍是幾個經濟區分別並存。史記貨殖列傳提出的經濟地理，總結戰國時列國的情勢，大別爲秦、蜀、三河、代北、鄭、衛、燕、越、楚（又分西楚、東楚、南楚）諸區。每區各有一兩個大都市爲該地核心，卻也是與鄰區貿易的中心。  
①貨殖傳中列舉的大都市，在漢代仍大半是重要的都會，例如鹽鐵論通有篇所舉當時「天下名都」，包括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軻、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②不但這些重要都會，在漢代仍治戰國之舊，甚至經濟地理的區別，也仍沿用舊的列國的區域。由此可觀見，漢代政治上統一了，而經濟地理的各個分區猶未整合爲一。漢初政局，先有異姓諸侯的叛亂，後有親藩的反側，也未嘗不可說明新統一的政治權威，還不足以統攝全局，於是各地每有攜貳之想。賈誼建議文帝分割大國以封諸子，正是打破地方的完整性，以降低向中央政權挑戰的可能性。③

西漢政治權力的中心在關中三輔，文化與經濟的中心則仍在關東，尤以三河爲主。鹽鐵論在討論當時形勢時，每以「宋衛韓梁」、「曹衛梁宋」、「鄒魯周韓」代表中央區域，同時以荆楚與趙、中山爲中間區，而以東方的丹竇，南方的交趾，西方的蜀隴，與北方的幽都爲四周外圍<sup>④</sup>，漢書地理志所載的戶口數字，是以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的版籍爲據。地理志在每一郡國下均有戶口數，縣下有戶口數則僅有十例而已。戶與口均見記載的是長安，左馮翊的長陵，右扶風的茂陵，潁川的陽翟及僕陵，有戶數而不見口數的則有河南的雒陽，南陽的宛，蜀郡的成都，魯國的魯，楚國的彭城。這十個縣，均是

郡國的首縣，這些大都市的城中及附郭人口當爲戶口數字的主體。漢書地理志僅列舉了這十個縣的戶口數字，或可理解爲當時最重要的都會地區。比較鹽鐵論的都會名稱，與這個單子，顯然的改變是三輔的重要性提高了，本在中間區的楚與外圍的蜀都有該區的大都會進入了當時的第一級大城之列。東漢徙都洛陽，毋寧是遷就三河爲文化經濟中心的事實。另一方面，由後漢書郡國志的人口數字觀之，長江流域的人口比漢書地理志所載元始二年的數字大爲增加，勞師貞一先生的統計足以說明這個事實<sup>⑤</sup>。

近來在西洋史的園地裏，所謂世界性經濟體系的形成，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題目。提出這個題目的是Emanuel Wallerstein，他的理論主要在說明西歐爲中心的工業經濟，逐步吸納了東歐的農業，構成歐洲體系，由歐洲體系又吸納了美洲與非洲的財富，最後吸納了東方世界的各經濟體系，終於構成近代世界性的經濟體系<sup>⑥</sup>。華氏的說法引發了所謂依賴理論，頗有人用來解釋今日第三世界的若干發展個案。華氏之說主要建基於中心與邊陲的差異，也著生在中心地區以其經濟優勢收奪邊陲的資源。追根究底，華氏的假設不外是馬克斯帝國主義剝削論的改頭換面。不過華氏特別標出中心與邊陲的相對性，及一個體系逐步形成的過程，則是頗爲有用的觀念，本文即擬以這兩個觀念來討論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國如何逐步形成爲一個整合的大體系？

現代的中國是一個國家；在古代，中國不僅是一個政治實體，也是一個經濟與文化的體系。這個體系無寧相當於具體而微的世界，其勢力所及甚至超越了中國本身的世界。這個體系的逐漸形成，是一步一步的中原擴散，不僅文化的影響力漸漸開展，經濟的互相依賴也漸漸建立了。區域之間的貿易正是各區交換資源的過程<sup>⑦</sup>。這個龐大的體系，論規模，比地中海體系要大，以形成的時間說，地中海體系在古羅馬時代漸漸成形，但到了中古時期，才成爲一個區間互依互存的體系<sup>⑧</sup>。中國的體系在先秦已經形成了有力的中心區。在意識形態上

，孟子所說天下定於一，即反映了體系已經成形。秦漢帝國是體系完成後，在政治秩序上的具體表現。不過，在大一統帝國的同一個政治秩序下，這個體系的充實與發展，又相對的更方便，更徹底了。

秦漢的經濟地理，若依史記貨殖列傳的區別方式，主要分為四大區：山西（崤函以西）、山東、江南，及龍門碣石以北。每區內都有若干分區，史記則按戰國的國別為分；每個分區的主要都市，即往往是戰國各國的主要都市<sup>⑨</sup>。秦漢帝國時，中國體系的中心長期的在中原，尤其三河地區。不過體系中各部分的關係也頗有變化。兩漢之交，光武起於南陽，卻以北道為光復的基地，即因北道密邇中原的東半邊，而後者則是當時最繁榮的中心地區。但在東漢之末，袁紹據有河北，終不能成事，而孫權據江東，劉備據四川，反而有鼎峙的力量。河北與江南的消長，正是中國體系中心在轉變的徵象，迨於兩晉南北朝，長江流域已儼然是另一個中心區，不僅能與中原抗衡，而且終於漸漸凌駕北方之上，至今北方在經濟上與文化上，不能不承認南方為中心區。

中國體系的擴充以兩種方式為主。一方面由於人口的移動，中國人所到之處，移民本身，及因為文化接觸而吸收當地原居民族，使其漢化，遂一步步的把中國體系擴充。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力量，吸納了各鄰近地區的資源，以貿易與交換，把鄰近地區拉進中國體系。如果史料充足，理想的研究方法是用區間貿易的種類與數量，作為量度體系中各區整合其互賴關係的指標。然而秦漢時代留下的史料有限，根本不可能以量化的方法作細密的研究。退而求其次，道路網是人口移動及物質交流的血脈，當也可以借道路網觀察中國體系擴充的大勢。同時，本文將以四川作為個例，由分析四川在中國體系擴充過程中的現象，觀見中國體系發展的形態。

勞師貞一先生昔有討論漢代交通的專文。貞一師指出，由漢代的政治中心長安，雖有道路網四達郡國，經濟道路的中心則在定陶，因為「天下之財富在關東，關東之財富湊於齊梁，而道路之中樞，實在

梁國」，陶爲午道之交，陶朱公所稱陶爲天下之中，高帝平項羽，即天子位，也獨在陶。由陶則東北至臨淄，北至邯鄲、涿薊，南至壽春，西南至宛及陽翟。更遠則及於成都、江陵、會稽、合肥、番禺。陸運以郵驛車傳爲主，道路轉遠，相當辛苦。大道之外，交通即不很方便，而尤以山區爲甚。海運以沿海的海道爲主，尤以南方爲盛<sup>⑩</sup>。由於漢代中國的中心區偏在內陸，黃河又不便航行，是以海運路線不過爲陸路交通網的延長線。水陸交通的重要性遂不能與陸路相提並論。

下文將分區敘述各地區在中國體系中的地位。由於四川一地的發展較爲清楚，本文遂以四川的情形爲例證，特予細部描述，藉以建立中國體系副中心發展的典範。

由關中直南，是入巴蜀而延長到南中的一條大道，這條路線的北段，有幾條平行的線路，經褒斜雨水河谷的褒斜道<sup>⑪</sup>，沿着灕水駱水河谷的灕駱道及沿着漢江的子午道，三路都經過崇山峻嶺，始達巴山秦嶺間的漢中盆地。另一條稍爲迴遠的陳倉道則由散關經武都繞秦嶺西邊入漢中，連接劍閣，沿嘉陵江谷地入四川，漢定三秦，即由此途。由武都南下，循白水過陰平的一段，若斜向西南取捷徑，則是鄧艾取蜀的路線<sup>⑫</sup>。前述經過南鄭的幾條道路也轉趨劍閣入四川盆地，入川後則循盆地西線入盆地中心的成都地區。若更循嘉陵江南下，則入巴郡<sup>⑬</sup>。由漢中東去，猶有一條沿着漢水通往南陽的道路，也即武關南陽道的南端，由巴郡順江東下，出三峽則是荊州，史記所謂「西通巫巴」的水路，三峽水流急湍，自古視爲天險，故在兩漢時入川仍以經過漢中爲主要途徑。由四川盆地南下，則是西南向經嚴道入越巂趨南中，及稍東南下經僰道由犍爲入夜郎<sup>⑭</sup>。

始自關中而終於南中的這一個南線交通網，事實上可分爲三截，中繼站在漢中盆地，而西南地區的中心是四川盆地。由四川盆地往南則是第三截，屬於以四川盆地向外開展的路線，西南路線的形勢遂比較複雜。與別處比較，荊州是往南的中心點，但荊州並不是一個封閉的地區，淮上是向東南開展的中心，也不是一個封閉的地區。四川融

合入中國體系，爲時比上列兩地爲晚，中國體系之伸入西南，幾乎全在漢代發生，這也是四川一例在本文比較突出的緣故。

四川盆地內部，有巴蜀兩個文化傳統。蜀人以開明蠶叢的傳說爲代表，巴人以廩君傳說爲代表。兩個族羣的居地以涪江爲界<sup>⑯</sup>，戰國時秦國先後滅蜀與巴，四川的資源輸入關中，造就了秦統一中國的事業，但是秦治蜀的方式頗爲特別，首三次封蜀侯，又三次因蜀侯反叛而誅滅，蜀既有侯，又有蜀相，卻又有蜀國守，這種措施頗有漢代在通西南夷後既設郡又有西南夷君長的情形<sup>⑰</sup>。揆之後世羈縻少數民族的方法，秦在當時也不過做到羈縻而已。在漢時，四川始逐步爲中國體系吸納，漢興，改雍州爲涼州，梁州爲益州，建立了益州的行政區，高帝六年分巴置廣漢郡，武帝又兩割蜀犍爲郡，郡數增加與開發的程度相應。桓帝時，巴郡土民有分巴的建議，至漢末始分巴爲二郡，劉璋又分巴爲三郡<sup>⑱</sup>，蜀郡分出廣漢郡後，武帝元光四年置蜀郡四都尉，元封元年分犍爲置牂牁郡，二年分牂牁置益州郡，六年以廣漢西部，蜀南部爲越巂郡，北部冉駙爲汝山郡，邛笮爲沈黎郡，天漢四年罷沈黎置兩都尉，宣帝地節三年罷汝山置北部都尉<sup>⑲</sup>。武帝時的四川行政區劃屢有更張，自然與通西南夷的事有關，四川也就進一步的與內地有了密切的關係。

秦定六國輒徙其豪傑於蜀，於是漢人大批移入四川，趙人卓氏、山東程氏以遷虜入蜀<sup>⑳</sup>。東漢末年，中原擾攘，又有南陽三輔的人口入川，當是第二批大移民，這批東州士，成爲劉璋割據四川的本錢<sup>㉑</sup>。成都開發甚早，未爲秦滅前，蜀國的首都即在此地，但鹽鐵論列舉天下名城，未見成都在內，至王莽時，天下五大都市，設有五均，成都遂與長安、洛陽、臨淄、宛同列<sup>㉒</sup>。漢書地理志在縣下列戶口數字者不過十處，有戶有口的是長安、左馮翊的長陵、右扶風的茂陵、潁川的陽翟及僕陵；有戶無口的是河南的洛陽、南陽的宛、蜀郡的成都、魯國的魯、楚國的彭城，成都有戶 76256 戶，僅次於長安（80800 戶）而居第二！如果這個數字也屬元始二年版籍，則公元二年時，四

川的中心地區的經濟，已可與核心區的地位相埒了。

如前文所述，四川是中國地區西南的樞紐，而成都平原即可稱為一個區域性副中心。四川盆地本身頗有等級的差異，巴不及蜀，盆地內部的資源集中在成都已不待言。華陽國志所謂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川之材，後半句指成都平原水利發達，四川天府，自然以成都為精華。前半句則指井鹽的利源，及冶鑄的銅鐵器用。秦遷民之中，卓氏來自趙，程氏來自山東，趙地的冶鐵技術，在先秦已為一時之冠。到了四川，他們不僅固山治鐵，而且挾其技術及經驗，也參與了漢初鑄私錢的活動。據華陽國志，臨邛有很好的鐵礦，「古石山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會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又云「漢文帝時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匹，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sup>22</sup>漢禁私錢後，冶鐵仍為四川的重要產業。漢代 48 處鐵官，在四川的有四處，蜀郡的臨邛、犍為、武陽及南安，漢中的沔陽。四處之三都在通向少數民族居地的交通線上，不是偶然的安排。於是南中西徼的資源也一樣集中在四川。卓氏、程氏冶鑄、貨賣的對象應是「傾滇蜀之民」「賈椎髻之民」。太史公認為巴蜀的殷富，不僅「地亦沃野，饒卮罍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而且「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sup>23</sup>兼具物產及轉口的雙重富源。

漢代工官是中央政府設在當地的生產機構，就地製造該處的特產，供官府之用。固然工官的產品並不投入一般性的市場，但該地之選中為工官地點，應是反映該地原有生產這一項特產的傳統，該地也應當仍有相當數量的私家作坊生產同樣物產，投入民間的市場。工官因此也有就地徵稅的權力，續漢書百官所謂「其郡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物」<sup>24</sup>。其分佈如下：河南（滎陽）、河內（懷縣）、潁川（陽翟）、南陽（宛）、泰山（奉高）、濟南（東平陵）、蜀郡（成都）、廣漢（雒）。八個工官中，四川盆地佔了兩個，其餘則或在核心區，或在著名的城。

四川及南中的物產，據華陽國志所載，巴有桑麻魚鹽銅鐵丹漆茶

蜜，蜀有珠玉金銀銅鐵鉛錫赭堊錦繡毛織物桑麻丹漆黃潤鮮粉，南中有金銀銅錫丹漆牛馬毛織品珠玉寶石<sup>22</sup>。其中包括自然產物（如鹽銅鐵……），也包括若干工藝品（如錦繡黃潤毛織品），揚雄蜀都賦文端所列物產大都為自然產物，但在「爾乃其人」一句下，則列舉「奇錦」等紡織品及「黃潤」等金銀加工的器用<sup>23</sup>。蜀刀蜀布漆器金銀鉛器應是四川地區運銷中原的項目。據漢書禹貢傳，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歲費五千萬，按顏師古注，三工官是「少府之屬官」，當是長安的三工官，而如淳注，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sup>24</sup>，則四川的兩處工官，歲費一千萬，規模不為不大。這兩處工官生產的金銀鉛器、大帶佩刀，到東漢中葉，始不復調，亦即不再交給皇室支配<sup>25</sup>。蜀刀是漢代四川的特產，四川學生入中原深造，文翁即以蜀刀布蜀物托帶給博士，顏師古注謂「以爲貨」<sup>26</sup>，似乎蜀郡弟子可以將刀布蜀物在長安出售，以其利潤作為生活的資費。漢代遺址出土有蜀與廣漢梓潼字樣的漆器者，遠到韓國的平壤、蒙古的諾音烏拉、貴州的清鎮。長沙馬王堆及江陵鳳凰山的漢代遺址，也有帶成市與市府的成都漆器<sup>27</sup>。這些帶有工官銘文的漆器可能是以賞賜或饋贈的方式遠達四方；但是民間作坊的產品，當可以貿易方式四銷。蜀地的紡織品亦遠銷中國，成都有錦官，專事生產鮮明的蜀錦。公孫述曾稱道蜀地「女工之業，覆被天下」，其盛可知<sup>28</sup>。蜀布行銷之遠，竟達大夏，引起了張騫的注意，遂有開西南夷的歷史公案<sup>29</sup>。在新疆吐魯番出土的織錦，由南北朝至隋唐的實物，均為蜀錦<sup>30</sup>。漢代蜀布可遠至大夏，想來絲道上織物，也有來自四川的蜀錦。

因此，漢代的四川頗有可以外銷的貨物，足以將四川納入中國的經濟體系內。由於四川的工官特多，成都的繁榮又可躋於五大都市之列，四川大約不是僅僅為中國體系內的一個外圍；這個地區，尤其成都平原毋寧是核心地區外的一個副中心，綜綰體系西南部分的網絡。由此，副中心四周的發展也當有若干程度的差距；如以人口的分布說，成都編戶 76256 戶，佔蜀郡戶數 268270 戶的 28.4%，佔整個益州

九郡的 7.5%，東漢時，整個益州人口比東漢時增加率為 149%，蜀郡人口在西漢時為 1245929 人，東漢時蜀郡加上分出去的蜀郡屬國的人口為 1826105 人，增長率為 147%，與全州增長率相當。然而東漢蜀郡人口的密度則由西漢的每方公里 51.4 人增加到每方公里 55.8 人，西漢每縣平均人戶數由 17885.27 戶增加到東漢 27313.82 戶，增長率為 153%，顯然，蜀郡的增長率領先全州。蜀郡為四川地區的中心，其繼續繁榮的軌跡甚清楚，是以四川地區顯著的也有一個當地的核心區<sup>④</sup>。

以四川地區的地形言，蜀郡地勢平坦，又有灌溉之利。相對而言，巴郡已在四川盆地的邊緣，但仍有幾條大河的河谷，其重要性及開發性當次於蜀郡。廣漢與漢中地處關中入川的要道口，但大道之外，山陵阻阨，是以大道所經固可為蜀郡的延長，此外則至多為外圍而已。犍為在南下大路上，這是川陝大道的延長線，重要性又差一等。由蜀郡向西，又是崇山峻嶺，至多只是邊陲而已。在蜀郡的核心區，城邑繁湊，市集棋置，王褒的僅約，雖是遊戲文字，但俳諧的文句也必有其當時的現實情況為背景。僅約中有一段描寫四川境內貿易，「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為府主求用錢，推紡惡敗樓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梱，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陽貿榮，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sup>⑤</sup>，從這一段文字尋索，由成都交通及貿易的地點，船運可由成都平原的湔水經運河入沱江，下駛江州，到達巴郡，以刀弓為貿易物工，可以南下益州市易牛羊。這是兩條遠赴外圍及邊陲地區的貿易路線。在成都平原附近可到綿竹的綿亭買席，到武陽買茶，兩地俱距成都不遠，卻也不在成都平原上。「都」指新都成都廣都，洛指洛水附近，此地有雒與繁二地。這一帶即是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區了，有市聚，有小市，有旁出的支線。稍為貴重一點的化粧品，即需由販夫從市集轉販入小市，而回程則收購紡織的原料（梱），犬鵝荷花及荷葉，

都是負販運銷的商品。這一個商業行為繁忙的中心區，大率也不過以一百公里為直徑的地區而已<sup>36</sup>。

因此，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中國西南部，至少可分幾層：平原為本區的核心區，廣漢與犍為兩郡鄰接核心的一圈外圍，巴郡、漢中及廣犍的其餘部分為更大的一圈外圍，而南中及西徼為邊陲。水陸交通路線中，北上關中的一線是聯結中國體系核心區的幹道，經漢水通南陽的一路是輔助線，三峽則順流東下易而溯江西上難，未必有很大的作用。由成都平原向西向南的路線，則是聯繫邊陲的道路。於是四川一地也有一束樹枝形的網路，聯繫中心外圍與邊陲，同時卻又賴棧道與中國體系相聯。成都平原成為西南部的副中心，正如關中是西部的副中心，淮上以彭城為中心是東南部的副中心，荊州為南方的副中心，中國體系依靠這些副中心的中繼，遂得以融合為一個龐大的體系。

漢代的史料有限，對經濟關係作量化分析幾乎不可能。因此本文將借人才——「人資源」的分析作為指標，分析四川各地的發展差距。華陽國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志方志了，該書對巴蜀、漢中、南中分區敘述，有不少郡縣列有「大姓」、「冠冕」、「四姓」之類的姓氏。這些大姓有的是當地土著豪強的後代，如南中的焦雍婁爨，但秦漢世遷民的後代可能更多，如江陽的王董張趙、魏趙先周，及閬中的三狐五馬，大半是三晉的舊族。除大姓以外，華陽國志也臚列各地名賢，這些人幾乎全是在中央或在地方擔任官職的人物及其家屬，此處可以稱為縉紳。大姓與縉紳可分可合，有的大姓出過縉紳，有的未出過；有的縉紳屬於大姓的姓氏，有的縉紳則不出於當地的大姓。

分別觀察大姓與縉紳的地理分析，可以就數點分析。第一，三巴地區郡縣有大姓的是江州、枳縣、臨江、平都、墊江、魚腹、南浦、閬中、朐忍、南充國、安漢及漢昌。蜀地有大姓的郡縣是成都、郫縣、繁縣、江原、臨邛、廣都、雒縣、綿竹、什邡、新都、郪縣、廣漢、德陽、武陽、南安、僰道、牛鞞、資中、江陽及漢安。漢中有大姓的是詳牁、慘縣、同樂、朱提、永昌及興古。這些縣大致都分布在陸

路交通路線及河谷地帶與平原富庶的地區。反過來說，沒有大姓的郡縣，大致都在偏僻的地區，如漢中的東南角與西北角，都遠離川陝交通線。在三蜀地區，只有西邊和南部的郡縣沒有大姓。在三巴地區，東邊郡縣沒有大姓。在南中則只有交通線上的郡治所在有一些大姓。大姓之所在，當可作為漢人移民所至的指標。

第二點，華陽國志敘述地方大事，若干大姓常是其中主角。例如桓帝時巴郡的掾吏與縉紳聯名請求分巴郡為二，署名者的姓氏與各縣大姓若合符節<sup>⑦</sup>。這些大姓亦因此往往為察舉徵辟的主要來源，縉紳與大姓也由是而可能重疊。不過，也有些大姓未曾有過名賢。華陽國志的先賢後賢與先漢以來士女，列舉益梁諸州的著名人物（亦即前文所說的縉紳層），大率出於 27 處：南鄭、梓潼、涪縣、成都、郫縣、江縣、江陽、慶都、廣漢、新都、綿竹、雒縣、什邡、郪縣、德陽、武陽、資中、南安、僰道、閬中、安漢、江州、墊江、臨江、漢昌、南充國、永昌、同樂。這個名單與前節有大姓的四十四個縣分名單相比，少了三分之一。有名賢的縣，當可視為已有人資源流向中國體系，則較之未有名賢的縣分，又更進一步的屬於中國體系了。審察這些縣分的地理位置，幾乎全是在交通路線上及成都平原上。名賢出現的時間，也顯示相當有趣的跡象，漢中南部的名賢早在西漢即已出現，梓潼的名賢於兩漢之際即開始出現，成都的名賢人數多，而且出現最早，鄉縣的名賢也在西漢即已出現。南鄭、梓潼都在由關中至益州的大道上，為入川必經之地；成都與郫縣則是成都平原上的中心。這幾處名賢出現較早，代表其納入中國體系為時最早。相對的，南充國的焦氏，在蜀漢至晉，四代有名，同樂的名人爨氏也在蜀漢以後出名，則表示這幾處納入中國體系最晚。不過，永昌與同樂的地方大姓與名賢相疊的現象，當歸之於當地土豪的壟斷政治權力。這是邊陲地區的特色，不能與成都地區名賢不必出自大姓的情形相提並論。

第三點，有些大姓不出名賢，而不少名賢的姓氏不在當地大姓之列。在華陽國志列出的一百零八個姓氏中，這兩類各佔二十八個。不

出名賢的大姓，大致分布在益州南部與東部，而在大姓的名賢集中在三蜀的腹地。前者不見於漢中，後者不見於南中。這一個分野的意義，可能由於不出名賢的大姓只是地方豪強，而在大姓的名賢則只能在教育文化水平最高，中國體系已充分建立的地區始克出現。

由以上三點綜合言之，益梁兩州大姓與名賢的分布情形應符合前文討論的地方區劃。川陝大道及成都平原是中國體系充分建立的地區，成都也是中國西南的副中心。三巴郡以及入南中的兩條大路，則是由成都輻射的延長線，可說是中國體系的外圍。南中與西邊東邊都是邊陲。以上的等級可由樹枝形交通網為主要線索。由副中心外延的交通線，只是支線，聯絡的地方在中國體系內的地位，也就以序降低了。

四川一帶的發展，可為下文其他各區的例證，本文的下文，即將依次討論漢代中國各地區的交通網絡個別的發展情形，以及各區在中國體系內的地位。

第一個地區是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由長安向北，有秦代已開通的直道，應北直上，經雲陽的甘泉，北走陽固，北上朔方九原。這是一條國防路線，秦皇漢武北巡，均曾循此直道<sup>38</sup>。但是這條道路也未必有良好的設置，更未必有經常的維護。武帝巡幸朔方，曾發現千里無亭障；武帝末年，猝幸甘泉，甚至長安甘泉之間道路也「不治」，右內史義縱因此得罪<sup>39</sup>。這條路北出蕭關，東轉也可經過西河至代，再由河東返長安<sup>40</sup>。這條國防道路，以討伐匈奴行軍及皇帝北巡為主要用途。元狩四年，武帝移徙關東貧民於西河北地上郡隴西會稽等處<sup>41</sup>，這批七十二萬五千人中，有多少徙入直北一線，史無明文。

由長安往西北，可經高平踰郿，也可循天水出郿西，過皇蘭直西則入羌中，若西北行出玉門關，便是西域<sup>42</sup>。古代東西交通路線，東端即是這一條幹線，漢代在這一條路線上的國際貿易，川流不息。若以人口移動而言，漢代的屯田，開了河西四郡，殘壘遺簡沿路觸處皆是。武帝元狩四年移徙關東貧民七十二萬五千口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

稽<sup>43</sup>，其中有多少徙來西北，不得而知，但若以屯田的規模判斷，這一區的移民當不會少。

上述向北及向西北兩線，則不外三輔的延長，西域無疑是中國的外圍，但地處邊遠，未能與中國發生持久的整合，直北一路及隴西則是三輔的外圍。兩漢時，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朔方、五原、隴西及河西都郡，人口為：

	西 漢				東 漢		
	郡名	城數	戶	口	城數	戶	口
北 路	安定	21	42725	143294	8	6094	29060
	北地	19	64461	210886	6	3122	18637
	上郡	23	103683	606658	10	5169	28599
	西河	36	636390	698836	13	5698	20838
	朔方	10	34338	136628	6	1987	7843
	五原	16	39322	231328	10	4667	22957
西 路	隴西	11	53964	236824	11	5628	29637
	金城	13	38470	149648	10	3858	18947
	天水	16	60370	261348	13	27423	130138
	武威	10	17581	76419	14	10043	34226
	張掖	10	24352	88731	8	6552	26040
	酒泉	9	18137	76726	9	12706	
	敦煌	6	11200	3835	6	748(?)	29170

各地在東漢時的人口均大減，可見這兩區都是經歷了嚴重的萎縮<sup>44</sup>。

關中是西漢政治中心。憑藉政治的權威，關中吸取了全國人才與物力，三遷七徙，充實陵邑，加上在帝都供職的無數大小官吏，使關中擁有全國人口的精華。貢賦及漕運則將東西兩方的財富，源源輸入。關中本身是涇渭流域的黃土原，自周代以來，即是農業區，但是關